

## 論壇

《文化研究》第十八期（2014年春季）：170-177

### 港台的抵抗運動為何呈現趨同性？

#### Why are the Resistance Movement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Converging?

吳介民

Wu Jieh-min

本文初稿寫於2013年底。原先設定的讀者，也包括香港、中國與海外華文讀者。這一年多來，台灣發生了許多新的反抗事件，尤其是2014年3-4月間的「318佔領運動」（太陽花運動），打亂了原先國共平台設定的兩岸協商進程，而香港爭取真普選之「和平佔中運動」，也在2014年9月，演變為將近80天的「雨傘運動」。香港「佔中」，從「有序規劃的公民抗命」演變為「遍地開花的公民主義行動」，沒有人預期到，歷史重擔倏然落在年輕世代肩頭上，而她／他們就這樣一路顛顛簸簸硬扛起來。港中政府秋後算賬的司法追訴已經開始。要向香港的民主運動者致上最深切的敬意，這一局本來就是完全不對稱的博弈，正因為如此，才凸顯公民抗命的力道與精神。你們改寫了抗爭史，也重新定義了社會運動。

這篇論文比較了港台運動形貌上的趨同，卻不能忽略其各自的運動脈絡與政治文化背景差異。尤其，當我們將分析的眼光投向微觀而細緻的運動紋理時，則兩地的差異經常是明顯而巨大的。這是本文續篇的主題，作者尚在寫作中。

作者提到：北京政權與許多中國人難以了解，為什麼「我對你讓利，你卻不領情」，為什麼台灣人對中國影響力如此警戒。太陽花運動爆發後，不少中國評論者仍難以理解「為何台灣不領情」；為何香港變得如此「勇武、桀驁不馴」。關於太陽花運動與中國因素的複雜關係，作者已經發表了另一篇論文，在此不深入處理。<sup>1</sup>本文等候刊

1 吳介民，2015，「『太陽花運動』への道—台湾市民社会の中国要因に対

登的這段時間，以原稿為基礎發表了另一篇論述較完整的論文，請有興趣的讀者自行參閱。<sup>2</sup>(2015/4/2)

## 8

中國的快速崛起與國力擴張，造成全球性的焦慮；東亞國家感受尤甚，而香港與台灣則首當其衝。2014年三至四月間的「太陽花運動」，佔領立法院長達24天，短時間改變台灣政治的樣貌，消息傳播全世界，也衝擊多年來國共兩黨所壟斷的兩岸政策遊戲規則。在太陽花運動之前，「中國因素」對台灣的滲透和影響，早已深入經濟、政治與社會領域。在香港，從2013年開始，針對爭取「真普選」，已有公民團體倡議「和平佔領中環」，並積極展開論述宣傳與「非暴力抗爭訓練」。一種針對中國因素而發的新形態公民社會抵抗運動，同步在港台誕生。

隨著中國國力擴散，資本與政治影響力遍及全球。在本文脈絡中，「中國因素」指涉中國政府、「跨海峽政商聯盟」、以及國共兩黨與跨海操作的資本集團緊密結盟，從行政部門、國會、文化、宗教領域，侵蝕著台灣的民主根基。在作者最初的論述中，中國因素是一個分析性的概念，對中國如何干預台灣，曾提出一個分析架構，指出一組「預測」與「提問」：

圍繞著國共平台所引發的疑慮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一組正在發生的關聯現象，可能如「白蟻效應」般侵蝕台灣社會的民主根基：

- (a)北京以其雄厚的經濟規模與財政能力，將台灣視為一個特殊的境外地區，通過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（貿易、投資、市場分享）而形成一個對於台灣內政的「影響力槓桿」（influence leverage，依賴理論的經典議題）。
- (b)被國共所壟斷的海峽談判，排除反對黨與公民社會的參與監督，是否會逐漸危害台灣民主鞏固的進程？

---

する抵抗」（到太陽花之路：台灣公民社會對中國因素的抵抗），《日本台湾学会報》第17号。

2 吳介民，2014，〈「中國因素」氣旋下的台港公民抵抗運動〉，收錄於謝政諭、高橋伸夫、黃英哲編，《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平》，頁130-144，台北：前衛。

(c)由於跨海峽資本的聯盟形成，在台灣國家機構中形成強有力的利益團體，而內建盤附在立法與行政機構？

(d)北京政府藉著這些準制度化（但不具有民主正當性的）機制，形成對台灣內部事務決策的影響力（例如否決權、政策發動權力、政策干擾權力等）？

國共平台侵蝕台灣民主根基的作用，一般人不容易在短期內感受到。但是，等到中共對台灣內政的影響力槓桿確立之後，則難以收拾。國共平台作為統治菁英與紅頂巨賈的金權饗宴，其所設定的議題，掩蓋、排除了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；而且缺乏正當民主程序。背後的利益集團，是寡頭壟斷資本（台方）與國家官僚資本（中方）的跨海峽聯盟。<sup>3</sup>

上述觀察與預測，一些已經成為「現實」，例如ECFA體制帶來的政治後果，台灣選舉期間利益關係涉及中國市場的財團負責人的言行，「服貿協議」的簽署在台灣引發的社會抗議，親中國政府立委的言論等等。此外，跨海峽資本的行為模式，例如旺中新聞集團負責人的發言，以及該集團的言論立場的親中化，也備受矚目。由於中國政府和跨海峽資本在台灣的影響力日漸增加，在台灣社會引起爭論和抗議，中國因素開始成為公民/社會運動者從事社會防衛的批判性修辭。

## 中國因素深入港台社會

近年來，台灣與香港的公民社會（以及國家－社會關係），都歷經了不等程度的震盪。在台灣，2012年初總統大選前夕，親近北京的台資財團發言支持「九二共識」，一直備受矚目。選後，「親中媒體」的強勢表現，包括旺中新聞集團老闆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言論，併購媒體通路的大動作，引發了一波「反媒體巨獸壟斷運動」。2013年中，台北與北京簽署「服務貿易協議」，談判過程保密，被批評為「黑箱服貿」，內容公佈之後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，因為受影響的層

3 參見吳介民，2009，〈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〉，《思想》第11期，頁141-157。

面很廣，包括弱勢產業、社會安全與國家安全的議題都浮出台面，甚至馬政府的一位國策顧問都辭職抗議，警告馬英九總統勿罔顧國家安全與整體國家出路。

在香港，2003年《基本法》23條立法爭議，導致幾十萬人上街抗議，中方及港府最終放棄這個立法企圖。2012年港府推動「國民教育」的政策，被一群高中生發動的抗爭擋下來。2014年，隨著2017年特首直選時程的逼近，「真假普選」成為關注重點。公民組織宣布將在2014年七月一日「佔領中環」，香港趨於分裂的民主運動似乎找到了一個新的團結點。但是，中方採取分化、反制策略，並動員香港內部的反民主力量（家長團體、基督教右翼、退休警官協會等等），組織反制團體，於是「愛字輩」團體爭先恐後出現，使得香港出現「躁動之氣」。香港新聞媒體自由度與自主性不斷受到減縮，威脅的手法甚至包括暴力襲擊，最近一兩年，有多位「非親中」媒體老闆或新聞從業者遭到暴力或威脅，港府治安機關都沒有破案。<sup>4</sup>

## 對「現代性」的差異態度

港台各有其獨特的社會運動傳統，不過在這一波公民運動風潮中，中國因素在兩地，無疑扮演者催化作用，雖然作用的模式有差異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晚近的運動中，青年學生（不只是大學社團組織，還包括高中生，例如香港的「學民思潮」）都參與在動員與領導的核心。港台兩地，一種以「在地關懷」為導向，排拒外來控制的情緒正在蔓延，而這股青年運動氣氛，同時帶有著濃厚的「反發展主義」的傾向。香港人對於「地產霸權」的憎惡，台灣人對「都市更新」、「土地徵收」、「怪手開入農田」的反感，正在加深對「破壞性經濟成長」的質疑，也在累積對資本與權力結盟的不滿。而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態勢，恰恰是見證了人類史上自工業革命以來，超大

---

4 最近一宗暴力案件發生於2014年2月，被《明報》解聘的前總編劉進圖，遭暴徒持刀攻擊致重傷垂危。此宗案件已經破案。一些評論者指向中國因素；但有人則認為與中國因素無涉（作者訪談）。

規模的開發、拆遷、城鄉移民、以及土地的「鋼筋水泥化」，引發層出不窮的民怨與抗爭。在這樣的發展狂潮中，維持高經濟成長的必要性，已被上綱到政權保衛戰的層次。兩種力量在抗衡：從中國（官方與主流價值）而來的是，對「物質主義」的憧憬，舉國致力於現代化建設；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對此種「物質主義現代性」的批判也正在中國興起；在台港，興起中的「後物質主義」，回歸生態均衡、減少對大地剝削、保護弱勢者生存權，吹起了反叛號角。這股強勁的反抗力量，本質上是對「現代性」進程的差異態度使然。而中國因素運作上的模式，即是通過國家官僚資本所挾帶的威權發展主義(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)而展開。

## 對「新殖民主義」的質疑

富裕的中國政府憑其財力在世界各地施展各式軟硬實力。近年，中國在非洲與拉丁美洲財大氣粗的強勢作為，已經引起「新殖民主義」的批評，<sup>5</sup>但北京長期對新疆、西藏的政策，在受管控的民族眼中，又何嘗不是一種殖民。同樣顯著的是，北京在華語世界的香港和台灣的經濟吸納與文化攻勢，也帶有中國式的殖民風格。如果我們將歷史眼光拉長，觀察一下德國在1930年代對其東南邊鄰國（那裡也住著不少「德意志人」）的政策，就會發現驚人的相似性。當時德國為了制衡俄國和西歐，加緊戰備物資儲備，刻意給予東南臨近小國「貿易優惠」，包括保證採購、高於市場交易價等手段，建構特殊的雙邊經貿關係。<sup>6</sup>對照一下香港在2003年與北京簽訂CEPA，台灣在2010年

---

5 參見C. Alden & C.R. Hughes, 'Harmony and discord in China's Africa strategy: some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policy', *China Quarterly*, 199(1), 2009, pp 563-584; S. Kleine-Ahlbrandt & A. Small, 'China's new dictatorship diplomacy: is Beijing parting with pariahs?' *Foreign Affairs* 87(1), 2008, pp 38-56; Mark Beeson (2013): Can China Lead?, *Third World Quarterly* 34:2, 233-250; 嚴海蓉、沙伯力, 2011, 〈農業資本主義, 抑或新殖民主義? —— 中國對尚比亞的農業投資〉, 《文化縱橫》(4), 頁40-45。

6 參見Albert O. Hirschman, 1980. *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* (expanded ed.). 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
與北京簽訂ECFA之後的發展，似乎抄寫著雷同腳本在演出：「讓利優惠」與「特殊照顧」以達成經濟吸納、親中資本收購新聞媒體、媒體言論親中化、鼓吹「中國模式」、修改教科書或組建「愛國主義」課程、在當地培養中方代言團體。

中國因素，是如此炙燙地影響著香港和台灣，以至於公民社會的抗爭動員逐漸導向北京。北京與大部份中國人都難以了解，為什麼「我對你讓利，你卻不領情」，為什麼台灣人對中國影響力如此警戒。需要先了解台灣民主化的歷程。幾十年來，推動台灣政治改革的主要動力之一，就是在拆解1949年國民黨播遷台灣帶來的「外來政權」(émigré regime)。台灣民主化的一個歷史理解角度是：將「外來政權」不合理、不公正的國家機器民主化、本土化的過程，讓在地社會恢復生機。聽慣了馬英九、龍應台等人話語、鍾情於「民國熱」的中國人，不容易觸摸到大部份中年以上本省籍台灣人的深處情感結構。而在國族認同方面，年輕世代（19到24歲的受訪者）自認為「中國人」的比例不到3%。<sup>7</sup>台灣社會對於來自對岸的控制欲望，是極度敏感的。太陽花運動以年輕世代為主力，其中不少運動幹部公開主張台灣獨立。這波運動，凸顯了北京「收買台灣」策略的限制。黎安友(Andrew Nathan)說：「中國為了追求兩岸統一，一直很有耐性地採取將台灣經濟與其掛鉤的策略。這種作法過去似乎很有效，現在卻受到嚴重挫敗。」<sup>8</sup>而北京似乎也在調適這個新現象，試圖做出回應，聲稱將「聽取台灣年輕人的意見」。<sup>9</sup>

## 港台抵抗運動的趨同性

同處在中國因素的氣旋下，台港之間的關係也在變化中。以往，香港與台灣政界的交往對象，以泛藍政黨為主；但在「國共和解」之

---

7 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「中國效應小組」2013年的調查資料。

8 「美學者：學運讓中國統戰策略嚴重挫敗」，《蘋果日報》2014年04月08日。

9 「兩岸新政策 孫亞夫：聽台灣青年意見」，《聯合新聞網》2014.05.06  
<http://m.udn.com/xhtml/ViewFreeArticle?type=news&cate=12&page=1&articleid=3790915&sn=1>

後，國民黨已不熱衷與香港交往。但在同時，香港人對台灣的興趣正在增加，《天下雜誌》最近還製作「香港人瘋台灣」專題。在我最近的訪談中，幾位香港政界人士說：台港民主黨派之間仍相當陌生，雙方還沒找到可以深入交流的語言。而民進黨一部分人士最近熱衷於「民共交流」，於是迴避與香港泛民交往。

但是，港台公民社運團體之間的交流與連接，顯然比各自的反對黨走得更前面。台灣的公民運動者了解到，香港最近的局勢，連「一國兩制」都面臨不保。而香港社會抗拒從「內地」來的「新殖民主義」經驗，值得台灣借鑑學習。一個自主、民主的香港，可以是台灣與中國互動的「緩衝區」，也間接保障了台灣的生存。

一位受訪者告訴我：2014年的「佔領中環」運動，是對北京抗爭的終局博弈(end game)，香港能不能爭取到「真普選」，能不能爭取更好的自治條件，就在未來一年，可見這場抗爭有多重要。台灣不能缺席；兩岸三個公民社會都不能「輸掉」香港。

港台之間的社會運動者，似乎從來沒有像最近這麼親近過。港台之間的公民運動串聯，北京當然不樂見。但是，從華語世界公民社會間，推動一場草根的、自主自發的民主運動，提升國際能見度，不只保護各自的社會生活，也可能對興起中的中國公民運動，激起某種正面效應。

香港與台灣的民主化與社會運動，各有其歷史脈絡，然而在中國因素的影響下，兩者在公民運動領域，卻顯現出「同形化」(isomorphism)，表現在抗爭對手的指認，例如「中國」、「中資」、「中國因素」；運動修辭構框，例如「本土」、「開放本土」；抗爭劇碼，例如「佔領」等等。中國政府對港台的干預，必須先搭建「經貿依賴關係」，使得兩地的抵抗運動，必須同時在「抵抗資本宰制」與「抵抗外來干預」這兩條軸線上並行。這樣的趨同性，是在強大的中國因素氣旋下，港台兩地運動者與運動場域間的交換、學習、擬仿與競爭中產生的。

## 新行動者介入牌局

兩岸關係，本質上，牽涉到兩部國家機器之間的互動，以及兩組「國家－社會關係」的互動。但目前國共兩黨的合作方式，將跨國關係限縮、或矮化為「兩黨關係」，成為「內政化」延伸，成為權力與資本交易的饗宴。

此回「服貿爭議」，之所以在台灣掀起巨大反撲，一個重要因素是諸多公民團體（其中有些異質性不低），採取了「社會團結」的行動模式，超越了所謂的「藍綠分歧」。在這個爭議中，除了傳統上的「高階政治」（例如國家安全），社會安全、階級、性別、文化自主性等議題也進入了政治辯論的議程。來自公民社會的「非國家行動者」（non-state actors），參與到「政治決策過程」，是最值得注目的新現象。要釐清服貿爭議中，各個行動者的互動關係，除了中共、國民黨、民進黨之間的互動，還必須在分析架構加上「國家－公民社會關係」，至少在台灣這邊是如此。2013年9月中，原定馬英九將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辯論服貿協議（後來因為「九月政爭」取消），當時公民團體即相當保留，原因很簡單：不想讓好不容易打開的兩岸議題「公共化空間」，又被限縮回「政黨交易」的平台。香港的佔中運動，也是公民團體試圖在民主運動中注入活水，讓特首普選等民主化議程成為公民運動，而非限縮於政黨協商交易。

台灣的反服貿運動，發動於公民社會，作為「新社會運動」的一股力量，是否將與其他運動議題匯流（例如，媒體自由、弱勢階級、工運、農民運動等）？這股運動能量，是否將與現有政治部門漸行漸遠，而形成新的政治力？在中國因素氣旋下，華語世界的草根串聯，是否將「台灣因素」、「香港因素」帶入中國？香港與台灣之間，有沒有可能形成某種公民社會／社會運動結盟？

太陽花運動的訴求，除了「反中國因素」與「國家安全」，也包括「民主與程序正當性」、「保護弱勢產業與團體」、「反自由貿易」等議題。台灣的公民社會運動，是否可能創造出一種更紮實的「社會團結」？這些問題，且讓我們密切觀察。